



老实做人真豪杰



核心阅读

老实做人，益处甚丰：存心老实，则心有余闲；持身老实，则身有余乐；治家老实，则家有余财；处人老实，则人有余爱；干事老实，则事有余裕。五谷惟有老实，然后可食；木材惟有老实，然后可用。可见，万物之理同样可以证实老实的必要性。如果稍加总结一下，所谓的老实做人，简言之，就是崇真尚朴，务质守俭。

□ 陈宝良

何谓“认真”？照着字面直白地去理解，大概应指认得“真”字明白、真切。稍加引申，释其词义，则是说做事必须切实、不苟且。说者易，行者难。此话大有道理，大抵可以证明“知易行难”的合理性。一个“真”字，并非人人认得清楚，即使认得明白，也未必就有好果子吃，随之在世俗人的处世哲学中，开始流行“凡事何必认真”的说法。

官场病的病根

老实做人，认真做事，有时反而會吃亏。譬如在明代，上至官场，下及民间，无不养成了诸多病态之风。细加勾勒，大致有下面几种病状：一曰“苟延”之病，说白了就是图虚名甚或行事苟且之病；二曰“软熟”之病，借此博取“持重博大”的美名；三曰“奔竞”之病，自守恬退之人已是寥若晨星。

奔竞之风演至极致，自然会出现抢官之风。这绝不是危言耸听，历史上确实曾经上演过如此的一幕。如明代的京师官场就有“讲抢嚷”嘲讽之语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当时官员流行“讲”“抢”“嚷”三部曲。讲者，求情之谓。若是一官有缺，就各趋权

势之门，讲论自己年资或体例应得此官之故。抢者，争夺之谓。先去求情者确定可补此缺，那么后来者或许不能得到此缺，于是无不争先趋走，争夺此缺。嚷者，流言诽谤之谓。一旦讲情、争夺不得，就不免流于喧嚷腾谤，广布流言，加以诽谤。

如此弊端土风，一旦形成，就会通过渐移暗转，慢慢使读书人的筋骨化为木石而不自觉，如同“中蛊”一般；即使心有所觉，但呼吸之地已为所制，心可得知，而声不能出，犹如“中魔”。可见，官场病的病根，终究还是因为那些官员只是满足于“做官”，而不是“做人”，更不愿“做事”。就此而论，老实做人，认真做事，倒是称得上是治疗官场病的一剂良方。

老实做人 认真做事

“老实”二字，从字义上看，确乎相当浅显，其实却蕴含着相当深刻的精神内涵。如何老实做人？历史上有两个学者可以拿来作为学习的样板，其中一个明代的吕坤，另一个则是清初的陈确。

吕坤是一个一生追求实政的官员，又是独具卓识灵心的学者。借助他的辨析，大抵可以知道，老实中的“老”，正好与“少年气”相对。那

么，何谓少年气？诸如追求侈丽的房子、美观的车马、豪华的筵宴、奢靡的器用、华美的衣服，乃至随意笑骂之类，无不可以归入少年气一类。老实中的“实”，则又与“夸鄙风”相对。什么是夸鄙风？诸如追求虚文而失去真率，讲究繁缛的礼节且喜欢多事，忘记本分而整日不安于位，羡慕豪华而竞相效仿，如此等等，均可归入夸鄙风之列。说白了，不过是一种浮夸之风罢了，借此支撑门面。在吕坤看来，老实做人，益处甚丰：存心老实，则心有余闲；持身老实，则身有余乐；治家老实，则家有余财；处人老实，则人有余爱；干事老实，则事有余裕。五谷惟有老实，然后可食；木材惟有老实，然后可用。可见，万物之理同样可以证实老实的必要性。如果稍加总结一下，所谓的老实做人，简言之，就是崇真尚朴，务质守俭。

陈确是明末大儒刘宗周的学生，又是一位一生追求实践的学者。当有人问陈确所学为何时，他明确以“惟学老实”答之，认为“老实”是自己的老师。照理说来，老实本是为人的本分，何必上升到学理的高度？其实，按照陈确的理解，所谓的老实，就是“分寸不得逾，事事贵寻绎。天地物不贰，陶虞道惟一”。其中还是含有“绳尺”，须人遵循。

如何认真做事？明代吕坤、鹿善

继、戚继光等人，对认真之说均有别开生面的解读。

明朝有一位官员，曾经批评他人道：“渠只把天下事认真做，安得不败？”言外之意，做事不必认真，否则必败无疑。这句话至少可以说明，明哲保身的苟延之风已经弥漫明代整个官场。闻听此说，吕坤大感惊讶。他认为，天下之事，即使认真去做，尚未必做得好，假若只在假借面上做功夫，成甚道理？在他看来，天下事只要认真去做，还有什么可说？当今最大的病痛，正患凡事不肯认真去做。由此看来，天下之事，只怕认不真，才导致人们依违观望，看人家的言为行止而定。假若认得真时，即使是“君亲”之言，亦不会甘心相从，更遑论“一国非之，天下非之”的事情！如果做事先怕别人议论，做到中间一被谤诽，就悄然中止，这不止说明此人无定力，更是没有定见。凡人做事，先要看到事后的功业，又要体恤事前的议论，事成之后，众人自然噤口。即或万一事情不成，但只要自己所做的事，是当下应该做的，就不必去计较成败得失。

做事认真，至鹿善继而集其大成，这从他将自己的奏疏集取名《认真草》可以窥见一二。鹿善继以“真”“痴”二字当作自己做事的标帜：真者，是空而无私；痴者，则是顽而不解私。真是为了与厯有所区

别，而认真者则又有别于厯者之笑真。鹿善继有自己做人、做事的原则，就是犯得一分难，便干得一分事；拼得一分官，便做得一分人。这就是说，为了干事，就必须知难而上；而为了做一个真正的人，甚至宁可放弃官爵。换言之，他做事的原则，就是置办一副真实心肠，先为国家，后为自己。

明代名将戚继光更是以愚钝自居，甚或倡导一种“愚愚”精神，可谓这方面的典范。戚继光将人分为三类：一是所谓的“上智”之人，其人只是厚积金帛，广殖田宅，贪求功名，保得首领，与时迁移而已；二是“下愚”之人，其人只知竭尽心力，整治本职之事，一心尽自己的本分，为国忘家，而将利钝付之他人，或许因为时运不济，生前难以拜相封侯，但死后必能血食文庙、武庙；三是“愚而又愚”之人，其人尽管面对谋不合、道不行的时势，还是愿意竭尽自己有限的精力，去维持应尽的职守，甚至陷阶在前，斧钺不懼。言下之意，戚继光是以“愚愚”自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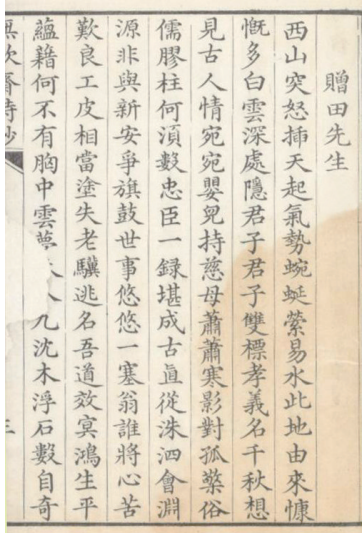
大无畏的担当精神

若是追溯其思想的渊源，无论是老实做人，还是认真做事，事实上有精神源泉：来自《中庸》的“诚”。按

照儒家的传统观念，“诚敬”是“进德”的基础。所谓“敬”，就是在日用之间“一念不敢忽易”；所谓“诚”，则是在日用之间“一念认真”。

归根结底，所谓认真做事，其实就是一种大无畏的担当精神，也是英雄实心任事的精神。从古迄今，豪杰精神一脉相承，真所谓“英雄所见略同”。如伊尹放逐太甲，就是一心把商家天下挑在自己身上，任劳任怨，何尝有些小的顾虑，一有顾虑，就任事不成；诸葛亮把“鞠躬尽瘁、死而后已”奉为自己做事的信条，不去顾及成败利钝；范仲淹坦言，自己只管做应该做的事，至于能否成功，则并不取决于自己，无暇考虑；韩琦认为人臣应该尽力事君，甚至死生以之，决不可事先担忧事情不济，辍而不为；李纲更是直言，事君之道，只可考虑进退之节，不必计较其中的祸患；戚继光主张，“鞠躬尽瘁，夕死何憾”，追求的并非肉体的永生，而是精神的长存；鹿善继更是别具一副真肝胆，不分炎冷，不计险夷，甚至敢于辞炎就险，把举世莫胜的重任担在自己的肩上。

如此种种，都是不顾利害，不计个人得失，正好契合于儒学的真精神。惟有老实做人，认真做事，才称得上是真正的英雄豪杰，方可使儒学真精神得以理性地回归。



《无欲斋诗钞》鹿善继撰



魏晋的隐逸之风

□ 赵 威



在隐逸与入世中寻 找平衡

孔子曾说“兴灭国，继绝世，举逸民”，隐士是人才资源，受到举荐重用才是时代昌明的表现，“天下无隐士，无遗善”。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老同学严子陵，王莽请他做官，他躲了起来。刘秀即位后，让人画了他的像，四处寻访。有人报告称，一个披着羊裘的男子在泽中垂钓，刘秀怀疑是严子陵，先后三次派人派车才把他请到京都洛阳。老朋友侯霸此时任司徒一职，听说严子陵来了，派人前去问候。没想到，对方不屑地说：“怀仁辅义天下悦，阿谀顺旨要颂绝。”刘秀前来看望，见他卧床不起，摸着他的肚子问：“为何不肯相助呢？”严子陵没搭理他，良久才睁开眼反问：“士各有志，为何相迫呢？”刘秀叹息而去。严子陵耕读垂钓富春山，成了刘秀一生的遗憾。

到了魏晋时期，隐文化成为风尚，士人追慕隐逸之风，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，“七贤”的林下之游成为世人的榜样。然而，隐的目的仍是入世，对出世与入世之间平衡点的掌握是在实践中不断试探出来的。竹林七贤就是寻找这种平衡点的试验场，七个人代表了三种态度，这三种态度又可以把当时的士林划为三类。

第一类是庄子式的“宁生而曳尾涂中”。嵇康无疑是这类中最决绝的，不仅体现在思想上，而且付诸行动。嵇康是曹魏的亲戚，自然要替曹家说话，但他不同司马氏合作的主要原因不是这个，而是不认同司马氏在名教这块遮盖布下做的勾当。嵇康本来是很谨慎的一个人，王戎曾说与嵇康相处20年，未尝见其喜怒形于色。力行老庄之术，越名教而任自然，是嵇康避世躲祸的办法，但是他的名声太高，司马氏怎么会容得下他？除非他放弃老庄而尊周孔，于是，派了许多人去做嵇康的思想工作。司马氏打着名教的幌子挟持皇帝，随时准备取而代之，很不体面，越不体面，就越要做足表面文章——鼓吹名教，而嵇康却“非汤武而薄周孔”，大唱反调。他要非薄的当然不是汤武周孔四人，汤武革命、周公辅政是儒家治世的德行，司马氏标榜名教，简直就是对他们的亵渎，嵇康“非汤武、薄周孔”，实则是讥讽司马氏。

老奸巨猾的钟会，帮助司马昭阻止高贵乡公曹髦的夺权企图后，被司马昭视为死党，其学说主张自然和司马氏一致，与嵇康对立。他写完《四本论》，打算找嵇康辩论一番，然而，他并不自信，揣在怀里

在仕与隐中进退的 三种态度

第二类是先隐后仕型的。郭象注《庄子·逍遥游》时，说了很多，无非是在强调大隐隐于朝，出仕与隐逸并无二致。其实，这是抄袭了向秀的说法。七贤中最具学者风范的实为向秀，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好教授的，对《庄子》研究很有心得，吕安读到他的论著，惊叹“庄子不死”。只可惜，向秀投奔司马昭后，无心著述，还有两篇没有写完就去世了。向秀的手稿随之散失，被郭象抄了过去，成了“郭庄注”，这是学术史上的一段公案，按下不表。单说向秀因嵇康、吕安

不敢拿出来，到了门外，远远地扔进去，转身跑了。钟会的狼须源于第一次见到嵇康时产生的心理阴影。当时，为了结识嵇康，钟会纠集了一群名流，一起去拜访。这样，既表示尊重，给对方面子，又抬高了自己的身价。嵇康和好友向秀正在树下打铁，见了钟会这帮司马门下秦养之犬，只顾扬锤锻铁，旁若无人，一句话也不说。钟会碰了一鼻子灰，从此便对嵇康又怕又恨，起了杀心。他向司马昭进谗：嵇康这家伙虽然是卧龙，但不为我所用，早晚是个祸害。

和嵇康能说得来的，唯有打铁伙伴向秀和老大哥山涛。山涛和司马氏是亲戚，政治上倒向司马氏，自然也要替司马氏做嵇康的思想工作。当他从吏部尚书位子上升迁时，极力举荐嵇康代替自己。于是，便有了那封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，嵇康名义上是与山涛绝交，实际上是一篇拒绝与司马氏合作的宣言。

嵇康死，向秀心里直打鼓，毕竟嵇康打铁时冷落钟会，在旁边拉风箱的就是他啊！于是，他赶紧跑到洛阳拜见司马昭，司马昭故意羞辱道：“听说你有归隐山林的箕山之志，跑到我这来干嘛？”向秀答：“退隐箕山的许由、巢父都是狂徒，其做法不足取。”司马昭听了大为满意。

第二类是先隐后仕型的。郭象注《庄子·逍遥游》时，说了很多，无非是在强调大隐隐于朝，出仕与隐逸并无二致。其实，这是抄袭了向秀的说法。七贤中最具学者风范的实为向秀，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好教授的，对《庄子》研究很有心得，吕安读到他的论著，惊叹“庄子不死”。只可惜，向秀投奔司马昭后，无心著述，还有两篇没有写完就去世了。向秀的手稿随之散失，被郭象抄了过去，成了“郭庄注”，这是学术史上的一段公案，按下不表。单说向秀因嵇康、吕安

被杀而转向，遭到司马昭一番奚落，他对《逍遥游》的注解观点便是对自己的辩护，并不是思想上的认同，而是全身之道的方法。

山涛亦属此类。嵇康虽然写下与山涛的绝交书，但七贤中，他和山涛的态度看似截然不同，其实在灵魂上是相通的。也有人说，嵇康之所以写下绝交书，是想借用这种方法保护山涛。人各有志，嵇康选择不合作，作为朋友，他不会与司马氏合作的。山涛有看法，反而还怕自己连累了朋友。后来，山涛举荐嵇康的儿子嵇绍做官，嵇绍向他咨询进退方案，山涛说，我替你想了很久了，天地有四时变化，何况人呢？意思是大丈夫行于世，要能屈能伸。

出身名门世家的谢安也是先隐后仕的典型。谢安从小就有名声，并受到宰相王导的器重。但是他拒绝应召，隐居到会稽郡的东山，与王羲之、许询、支道林等名士、名僧交游，倾心清谈。一次他与王羲之一同登上冶城遗址，谢安追古思远，一派超脱世俗之志。王羲之劝道：“禹禹勤勉国事，奔忙劳苦，手脚长满老茧；周文王从早忙到晚，无暇吃饭，总觉得时间不够用。现在国家正处于危难中，每个人都应当为国效力；而不切实际的清谈只会废弛政务，华而不实的文章会妨害大事，这些恐怕都是不合时宜的。”谢安说：“秦国任用商鞅，仅两代就亡国了，难道是清谈惹的祸吗？”谢安偷梁换柱的辩论有些强词夺理，他心中其实是有自己的小算盘的。当时，“王与马，共天下”的格局因为王敦的叛乱，蒙上了阴影，于是，外戚庾家受到重用，庾与王在朝局中开始裂土分茅。另外，权臣桓温开始崛起，这样的斗争开始白热化，而陈郡谢家还没走上前台。谢安显然不想卷入此中，王羲之是王家的人，谢安跟他谈话往往不着边际。其实，他是在等待

机会。

后来，朝廷几次三番地征召谢安，他一概推辞。就连管组织人事的吏部尚书举荐谢安为吏部郎，也被他写信拒绝。于是，有些官员就给朝廷上书，说谢安的坏话，这小子历年不应召，应该将他禁錮终身。当时执政的会稽王司马昱认为：“安石（谢安的字）既然能与人同乐，也必定能与人同忧，再征召他，他肯定会应召。”当时，谢安的弟弟谢万是一位封疆大吏，担任豫州刺史。谢安虽然隐遁山林，但其名声超过了在朝中做官的谢万，竟然获得了宰辅的声望。后来，谢万北伐失利，危及谢家安危，谢安在这节骨眼儿上，终于出山，这时他已年过不惑。

第三类的代表便是阮籍，他与嵇康的主张是一样的，但没有嵇康的决绝。阮籍的隐忍连司马昭都佩服，叹其乃“天下至慎”，然而，“隐忍”在心中形成的块垒，只有借酒来浇灭。杀了嵇康的人，还要杀阮籍，司马昭保他，所以他才活了下来——在司马昭眼中，他不做官不要紧，只要闭上嘴就行。作为报答，阮籍为他写了劝进表。

七贤都有隐士之心，就连热心于做官的王戎，也不时向人炫耀一番自己当年的林下之乐。王戎做尚书令时，当他路过黄公酒肆前，对客人说，我从前就是在这里和嵇康、阮籍一起畅饮、同游竹林的，自从他们二位亡故以来，我为时务所羁绊，今天看到物是人非，真是往事邈远、如隔山河啊！

